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

张 三 萍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三萍(1965-),女,湖北仙桃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哲学的对立,基于对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在理论内容、致思倾向和话语系统上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是对立与冲突。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和其对立面的相互碰撞中显示出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文主义哲学;对立;融合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3-0276-0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现代化大潮席卷全球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现象,又是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从哲学上看,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同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三大思潮。在长期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显示了它对中国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由于不能透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既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也无法担当救国救民的历史任务。这是近百年的历史证明了的事实。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与其他思潮的碰撞和激荡,它们之间既有原则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也有相互影响和借鉴,直至今天也是如此。本文仅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关系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20 世纪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

20 世纪中国三大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质上代表了不同社会力量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三大哲学思潮的形成要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进程,使中国被动地卷入全球现代化行列。从此,中国人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力求抵御列强,救亡图存,但每一次斗争都失败了。在多次的失败中,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而中西冲突的实质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没有观念的更新,就不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其目的是使广大群众从旧的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代之以民主和科学的先进思想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在思想方面开始走入新世纪,跨入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五四”运动以后,各种西方哲学潮水般涌入中国,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

三种思潮中最先崛起的是科学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探求中国现代化途径的过程中,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与中国政治紧密结合的儒家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应

加以彻底批判。他们认同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取向,以吸收、融合西方近代经验主义传统和现代实证主义思潮,作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哲学的思想资源。科学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是:强调科学的意义和科学方法,认为只有科学方法才能对宇宙人生予以正确的认识和说明,主张把哲学建立在实证和经验的基础之上,使哲学科学化、实证化,排斥非实证的、非科学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

科学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必然激起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反对。更为重要的是,20 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暴露出自己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西方社会处于极度躁动不安之中,欧洲社会思潮也开始转向,一些思想家开始关注当代人的精神危机问题,并反思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他们认为,由于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过度伸张,才造成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因此,西方文化的出路就在于摆脱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重新关注人类的生存本身以及价值意义等问题。西方社会思潮的这种转向,对于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1](第 232 页)这里表明:科学不是万能的,它可以为人类提供物质上的方便,但并不能解决人的精神价值以及生活的意义问题。

人文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出现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不可能用科学或科学方法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不赞成把哲学科学化和实证化,认为哲学应有不同于科学的人文精神和形上追求。人文主义者反对科学主义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观点,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力图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中发掘出现时代仍有生命力的内涵。这样,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崛起,就成为中国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的主线。

后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昭示下,通过不同的途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曲折过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作了概括性的总结:“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一天一天的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第 1470-1471 页)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三种哲学思潮的形成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要求密切相关。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向外扩张的结果,中国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行列的,是后生型现代化。把三种哲学思潮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考察,其实质是对文化的三种不同选择,也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就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来讲,它们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同意中国需要现代化,而在于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出发,首先依靠人民群众以暴力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起人民的政权,才能实现现代化;人文主义则认为只有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传统精神”,中国的土壤就能开出真正的科学和民主之花,实现现代化。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哲学的理论分歧与对立

基于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在致思倾向和理论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别。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竭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唯物史观观察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成功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理论到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致相同的时期,以现代新儒家为主线的人文主义也经历了发生、发展、成熟的历程。在建构自己理论的过程中,他们具有与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致思倾向。与西化派仅以时代性来衡量文化不同,人文主义强调文化的民族性。面对欧风美雨,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因素,是我们必须要吸收的东西。但是,他们认为中西文化的融合不是以放弃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质和自主性为前提,而是必须以中国文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为主导来把握、吸收、融合、转化西洋文化。在这一基本原则下,人文主义者建立起了既不同于传统儒学,也有别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主义的理论体系。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哲学来说,其理论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本体论方面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待本体论方面,走过了一个从否定本体论到建立本体论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阶段,李大钊、陈独秀对唯物史观作了一种科学主义的理解,强调唯物史观科学、实证的意义和方法论意义。这种理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从一开始就联系起来,使哲学更贴近生活。但对唯物史观的科学主义的理解,实质上把唯物史观置于本体论哲学之外。其后,瞿秋白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宇宙观的形式,率先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作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阐明,但是,他过分强调人之外的客观自然界,忽视了人、人的活动、人的实践的意义,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带有强烈的自然本体论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缺乏深刻的论述。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李达、艾思奇等通过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和“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创造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哲学体系。在哲学的研究对象上,强调哲学不但研究本体、知识和形式,而且研究现象、事实和实质;在哲学的体系上,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主张从知识论的角度对本体论问题作出合理的说明。也就是说,辩证唯物论既是本体论的,又是知识论的。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中国人文主义哲学在科学与哲学二分模式下,反对把哲学科学化和实证化,强调哲学必须研究本体论。人文主义的开山始祖梁漱溟,就以王阳明心学为根基,通过吸取、改造佛教唯识学和西方现代哲学,阐发了其生命本体论的构想。其后,人文主义者都建立了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张君勱的“新宋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但它们都是与辩证唯物论不同的唯心主义的体系。张君勱的新宋学确认“心为实在”,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把“心”、“性”、“智”当做一切事物的本体,贺麟认为物是心的表现,这些都表明,他们的本体论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冯友兰强调“理在事先”、“理在事上”,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二)认识论方面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结合起来,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实践的基本形式、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对认识的矛盾运动、对认识的全过程阐述,更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人文主义则在区别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基础上,更突出德性之知的重要性。与此相应,在哲学方法上,他们更突出非理性的直觉的意义和作用。梁漱溟被称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张君勱在著名的《人生观》讲演中指出人生观起于直觉;熊十力提出“性智”和“量智”的区分,并认为带有直觉特征的“性智”,才能解决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的问题;冯友兰提出了“负的方法”。纵观人文主义的认识论,崇尚直觉是其基本特征。

(三)历史观方面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用唯物史观观察和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强调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落后的原因,惟有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

会,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证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后的伟大成功,再一次证明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也证明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人文主义者在对中国近代历史现状的分析和寻找中国的出路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向。他们不是从社会现实、而是从思想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他们认为,道德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在于传统道德的没落、圣学的破坏。熊十力认为,“万化生于人心,人心正,则万事万物莫不一于正。人心死,则乾坤息,尚何事物可言。”^[3](第80页)而贺麟也认为,“就立国根本言,道德为立国的大本。国家基础不是建筑在武力上,也不是建立在经济上,而道德才是维系国家基础的命脉。”^[4](第25页)因此,人文主义者认为只有从道德上着手,从人心改造上着手,才能挽救中国于落后的状况。如张君勱则认为,中国新文化的建立首先是人生观的建立,中国社会的改造首先应从人生观上入手。他说:“我人今后要改造中国政治经济,其入手处应从人生态度着手或曰人生观应彻底改造。有此新文化,不怕无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此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若无新人生观或新文化为衬托,恐怕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5](第288页)用什么来改造人生观?人文主义者开出的药方是:返本,“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6](第539页)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现代化的民主和科学的因素,人文主义者对此也作了一些客观理性的分析,并着重探讨了把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的种种设想,如牟宗三的“返本开新”说、余英时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说、杜维明的“创造性的转化”理论等,人文主义的这些提法不乏真知灼见。但不难看出,在历史观上他们所持的都是一种道德至上论。

由以上分析,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分歧的焦点,就在于历史观及由历史观所反映出来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求从社会的现实情况为基点,从根本上彻底改造中国社会,通过经济的现代化带动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人文主义则是寄希望于文化重建和道德改造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人文主义的道德至上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可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一条道路,也找不到可以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

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在哲学的基本理念、致思倾向和话语系统上的差别,使得它们从一产生就处于对立之中,它们的论争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并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人文主义就对之进行了种种指责和诘难。梁漱溟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说物质环境与意识或文化创造,只能说是缘,不能说是前者为后者之因,不能说物质决定意识;熊十力认为唯物论是一种粗而未精之科学,称不上精深之哲学;贺麟则诘难马克思的辩证法,称马克思并没有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若把辩证法看作一把刀,那么黑格尔用之剖解脏腑,马克思用之割外症。”^[7](第70页)在对唯物史观的责难中,梁漱溟否认生产力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终动因,认为“还有个使生产力发展可钝可利的东西”,这可使生产力可利可钝的东西就在人类的精神方面。贺麟则称唯物史观是一种外观法,认为影响思想的经济原因是一种外在的原因,从经济的原因分析思想就是外观法,从思想本身去看思想,就是内观法,并进而称内观法是比较深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文主义的活动转移到港台地区。远离故土的特殊境遇,使人文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更是变成一种情绪化的宣泄,牟宗三甚至以反马克思主义为终身职志。人文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和诘难甚至在第三代人主义者的思想中还时常看到。

针对人文主义的责难,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有力的回击。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问世,就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同梁漱溟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不同,陈独秀、李大钊等皆视文化问题应依赖于物质生活基础的解决。“科玄论战”中,针对张君勱的“人生是自由意志的、主观的”等唯心主义的观点,陈独秀、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武器,从科学与哲学、必然与自由等关系的角度,对科玄论战中触及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社会进步和个

人自由、真理观和价值观等问题作了有说服力的回答。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陈家康、胡绳等纷纷撰文,对“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进行了批判。本着唯物史观和科学的实践观,以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文主义的批评切中要害,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并显示出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思想体系。但是,它们都是基于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些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文主义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历史事实,并慎重对待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所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如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认识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问题、历史领域中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价值问题等,是人文主义所一向关注的问题;在处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哲学也各自突出了不同的方面,人文主义也有值得马克思主义借鉴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在对立中也有融合。这种融合,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一些人文主义哲学家经过比较,逐渐放弃了自己的哲学主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冯友兰和贺麟是最典型的代表。冯友兰在晚年所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就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贺麟在《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中坦率地说:“由于受了实践论的启示,……使我敢于初步否定并批判我素所服膺并受过影响的程朱陆王的学说。”^[8](第 208 页)还有一些人文主义哲学家,在对某些问题的思考上,也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梁漱溟就是典型代表。梁漱溟文化观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相迥异,但正如艾恺中所说的,“梁漱溟对西方资本主义所作的保守主义的批判如此明显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9](第 66 页)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和争论中,也在不断完善自己。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为例,在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上,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独秀、李大钊等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对中国文化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则全盘肯定,这使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上,注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进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纠正这一错误观点,1938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谈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0](第 534 页)在 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谈到“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1](第 707-708 页),毛泽东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的清理,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文化观相接近、融合。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糟粕和精华的选择标准不同,但在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历史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成果——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现代化的道路。这与中国人文主义始终不承认“现代化就是西化”并致力于寻求独特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旨趣殊途同归。同时,适应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第三代人文主义在理论上也发生了某种转向,他们不再关注如何从传统中转出民主与科学而是致力于探究传统文化如何适应民主社会的发展。此外,第三代人文主义与西方后现代理论的结合,对现代化中过分物质化的倾向也具有一种纠偏补弊的作用。人文主义的这些变化,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将逐步走向融合,但是我们必须注意,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的根本对立不可能因为融合而取消。在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实现以前,它们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根本差异不会消失。(2)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的融合不可能以人文主义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吸收人文主义的合理因素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

[参 考 文 献]

- [1]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C].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第1卷.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 熊十力. 十力语要: 卷3[M]. 武汉: 湖北十力丛书印本, 1947.
- [4] 贺麟. 文化与人生[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5] 张君勱. 张君勱集[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3.
- [6]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第1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 [7] 贺麟.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8] 贺麟.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9] 艾恺.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严真)

Centu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Humanist in 20th

ZHANG San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Sanping (1965-),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is different from Humanist philosophy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main theory,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language system etc. This is wh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contradicts with Humanist as soon as the both emerge. But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is integrating with Humanist meantime. Marxist philosophy shows the great vitality in the course of contradic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opposite side.

Key words: humanist philosophy; conflict; integrate